

适应与认同：1860—1950年南洋琼侨社群的生存策略与文化变迁

琚博雯 王宇 (通讯作者)

三亚学院, 海南省三亚市, 572000;

摘要：本文聚焦于1860至1950年间南洋琼侨社群的生存与发展。从出洋动因、经济适应、社团建构、文化互动与身份认同这五个层面梳理, 揭示琼侨在殖民统治与异质文化环境中如何通过自组织方式实现社群整合与文化延续。在殖民地和异质文化的复杂环境中, 琼侨凭借地缘、血缘与业缘关系建立功能完备的内部自治体, 在文化实践中形成传统与地方色彩, 发展出多层次的身份认同体系。琼侨的历史经验, 为理解近代海外华侨的适应机制与文化韧性提供了重要视角。

关键词：琼侨; 南洋; 社团组织; 文化适应; 身份认同

DOI：10.64216/3080-1486.26.02.050

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 是中国社会剧烈转型的时期, 也是琼侨在南洋地区逐步形成具有凝聚力社群的关键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琼崖地区被迫向西方势力开放, 原有社会结构受到冲击, 加之自然灾害频发与赋税沉重, 大量琼州民众不得不选择远渡重洋, 赴南洋谋生。在这一过程中, 不少琼侨以“猪仔”身份被贩运至异乡, 男性多沦为矿场或种植园的苦力, 女性则常陷入更为悲惨的境地, 整体命运充满艰辛^[1]。

现有关于琼侨的研究虽已积累一定基础, 如王翔对南洋琼侨社团组织模式与生活实态的开创性梳理^[2]、张逢博对新马地区琼侨社团建立及其综合职能的梳理^[3]、王帅君对以海南岛为基点的华工出洋史实与动因的宏观分析^[4]、范若兰对海南妇女出洋路径的性别史考察^[1]、冯思露对新马地区琼侨会馆社会功能与信仰体系的深入剖析^[5], 均在社团史与社会史等维度推进了该领域的研究。然而, 多数成果或将“生存策略”与“文化认同”视为两个并行的线索, 本文则尝试以历史人类学与文化谱系学为方法, 聚焦琼侨在跨境流动、经济适应、组织建构与文化调适中的策略选择, 力图呈现一个社群在异文化语境中如何维系认同、实现生存与发展的完整图景。

1 出洋的历史背景与动因

琼侨大规模南下南洋, 是十九世纪中后期全球劳动力流动与华南地方社会变迁互动的结果。外部因素方面, 东南亚地区此时大部分沦为欧美的殖民地, 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原料供应地, 锡矿开采与橡胶种植业迅速发展, 迫切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殖民者在非洲奴隶贸易终结后, 将招募重心转向华南沿海, 琼州因地缘邻近成为重要劳工输出地。

内部推力同样不容忽视。清政府在《天津条约》中将海口辟为通商口岸, 出洋禁令随之松弛; 1876年海口正式开埠, 海口至东南亚新航线的开辟也显著缩短了海南与南洋之间的航程, 这为琼州民众出海谋生提供了历史性的契机。

与此同时, 海南岛内赋税繁重, 据《琼州府志》所载, 杂税名目层出不穷, 民间负担沉重。“各州县通共征杂税税契, 当饷等项银七千四百四十两(后因故减除豁免二, 八九一两, 尚存四, 五四九两)”^[6]。加上海南地处台风频发地带, 1884至1947年间记录台风达244次, 此外还有地震、旱涝与瘟疫等灾害接连不断。社会动荡亦未停息, 战乱频频, 如1853年天地会起义、1878年琼州汉黎联合起义等, 底层民众的生存压力愈来愈重。在此背景下, 出洋谋生成为许多琼州人绝望中寻求生路的无奈选择。

琼侨的南下, 经历了从被强制劳役到自主经营的转变过程。“猪仔”贸易是其中充满血泪的一章。这一贩卖体系有外商央行与地方势力共同维系, 在沿海口岸广设“猪仔馆”, 以欺骗或强制的手段招募华工。这些华工, 在航程中饱受折磨, 抵岸后则被投入种植园、矿山从事高强度劳动。据不完全统计, 清光绪年间自海南出洋的华工超过24万人, 其中多数属于此类契约劳工。琼侨民间歌谣中“无奈卖身当猪仔”“十个去番, 九个打工, 你去挖矿, 他去搬运, 我当种胶工, 工不相同苦相同。”这些唱词, 正是这段历史的佐证。

与此同时, 也有部分琼侨通过亲友牵引、同乡介绍等渠道“自主出洋”。他们最初到达南洋时多依靠所谓“三把刀”行业立足——即菜刀(餐饮)、剃刀(理发)、砍刀(垦殖或橡胶园劳作), 展现出底层民众在异乡自

谋生路的顽强韧性。

随着时间推移,琼侨的职业结构渐趋多元,但在东南亚五大侨群中,其经济实力仍相对薄弱,职业结构以小本经营为主。二十世纪初,马来亚地区的海南人中近半数仍从事橡胶园工作,其余则逐渐拓展至理发、咖啡店员、杂货店员及西洋家庭佣役等领域。至1930年,新加坡琼侨中从商者仅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5],其中又以海南咖啡店与鸡饭店最具特色。1929年的调查显示,新加坡五百余家琼侨商店中,咖啡店数量达174家,居各类商铺之首^[7]。这一突出的行业特色不仅成为琼侨谋生的重要手段,也为后续组建“琼侨咖啡公会”等业缘社团奠定了社会基础。

2 社团组织的建构与功能

琼侨在南洋的社群组织,经历了从以神庙和宗祠为中心,到地缘会馆与业缘团体的发展过程。在殖民统治缺乏有效治理的背景下,这些组织成为琼侨维系文化认同、实现社会自治的重要载体。

早期琼侨多依托民间信仰建立联系。海南本土神祇如天后、水尾圣娘、洗夫人、兄弟公等,随移民南迁并在新加坡、槟城等地落地生根,成为凝聚乡谊的象征。以“琼州天后宫”为代表的庙宇,不仅是祈福场所,也兼具聚会、议事与互助功能。随着人口增加与社群需求日益复杂,更具行政功能的同乡会馆陆续成立。1857年成立的新加坡琼州会馆是南洋地区较早的琼侨地缘组织之一,标志着琼侨社群从松散的乡土联系走向了制度化的组织建构。其后设立的“乐善居”慈善医疗机构,标志着琼侨福利体系向制度化迈进。会馆的建立,为初来乍到的“新客”提供落脚之所,为失业者介绍工作,并为贫病同乡提供基本的医疗救助,真正成为了同乡在异乡感到“温暖和安慰的独特场所”。

血缘组织在琼侨社群中同样发展迅速。1887年,在符愈贵、运政等先贤带领下,以新加坡密驼律52号为社址,成立了符氏社,开创了琼侨宗亲组织先河;此后韩氏祠、龙氏公等相继设立,至1920年代,新加坡已有二十余个宗亲会。马来西亚地区则以槟城长林社、陈氏宗祠等为代表,虽规模不及新加坡,却在凝聚同姓移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业缘性组织是琼侨组织网络的另一支柱。以咖啡店业为例,1934年成立的“琼侨咖啡公会”在协调原料采购、统一市价、交流信息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有效提升了行业整体竞争力。此类业缘团体与地缘、血缘组织相互交织,共同构建起琼侨社群的内部支持体系。

琼侨社团在内部治理方面功能齐全,堪称“自治小社会”。会馆普遍设有互助部门,为初抵南洋的“新客”

提供临时食宿,并利用同乡网络为其介绍工作。通过会员缴纳年捐设立基金,为贫病同乡提供医疗救助,为身故者购置“义山”并办理丧葬,体现了“生有所依,死有所归”的传统观念。新加坡琼州会馆管理的“乐善居”慈善医疗机构收容孤苦同乡,即是明证。在纠纷调解方面,由于殖民政府无力处理华侨社会内部事务,会馆自然成为民事纠纷的调解场所,主要处理互助储金会债务纠纷、合股经营争议等。与此同时,社团还是弘扬文化、培育后代的核心阵地。会馆通过兴办华文教育系统传承文化,如新加坡琼州会馆创办的育英学校,以及马来西亚各地由会馆支持的侨南学校、琼林学校等。战后更设立奖助学基金,资助优秀子弟深造,使文教功能从普及延伸至提升。

对外方面,会馆领袖常成为殖民政府与琼侨社群之间的中介,负责传达政令、协调税赋,并在族群利益受损时组织集体行动,展现出卓越的协调与代表能力。这一角色,使琼侨社团在殖民统治缝隙中为族人争取到一定的生存空间。当面临其他族群的经济竞争或社会排挤时,会馆成为组织集体行动的代表。在行业利益受到侵害时,业缘公会便会通过会馆的网络进行动员,与其他商会进行谈判或向政府请愿,有效维护了行业利益。

3 文化融合与冲突的双重轨迹

在南洋的生存与发展中,琼侨的文化实践呈现出融合与冲突并行的复杂轨迹。一方面,他们通过主动的文化建设,顽强地延续着自身的文化血脉。其中,兴办华文教育被视为传承的根本,各大会馆不遗余力地创办学校,如新加坡琼州会馆于1910年创办育英学校;马来亚地区槟城益华、雪兰莪侨南等多所华校,不仅教授语言知识,更传递着儒家的伦理观念。与此同时,源自海南的民间信仰,如天后、水尾圣娘与洗夫人,也随着移民南迁,其庙宇成为社群凝聚精神与开展互助的核心场所。这种文化坚守也并非固步自封,在建筑、饮食等物质层面,琼侨积极吸纳了南洋与西洋元素,形成了独特的“南洋琼侨风格”,“侨乡第一宅”蔡家大院,既保留琼北民居的布局特色,又融入了南洋骑楼与装饰元素,便是这种文化交融的生动体现。

然而,这一融合过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琼侨在南洋的生存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与本地社群的摩擦与张力。经济领域的资源竞争是矛盾的重要来源。欧洲殖民者为开发东南亚资源,大量引入华工,从事土著居民不愿或不宜从事的艰苦劳动。作为后来者,他们往往需要挤入已被他人占据的行业,凭借勤勉与较低的经营成本,在咖啡店、杂货零售等领域逐渐立足,这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本地居民的经济空间。除了经济层面,文化习俗与

生活方式的差异也进一步加深了隔阂。琼侨保留了中国传统文化、海南方言、祖先祭祀与节庆习俗，这与当地土著的文化、宗教差异较大。同时琼侨形成了相对封闭的宗乡聚居网络，聚居于“海南街”等类似相同社区，进一步强化了与本地社会的疏离感。此外，欧洲殖民者常采用“分而治之”策略，对不同族群实施区别管理，人为地制造了劳动力市场与居住区域的隔离。这套制度限制了琼侨与在地社群的深入交流，而在双方出现纠纷时，殖民政府又常持偏袒或放任的态度，致使矛盾缺乏公正的调解机制，从而进一步加剧了族群间的紧张关系。

面对长期的生存压力和文化差异，琼侨群体与会馆组织逐渐摸索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适应方法。会馆不仅是琼侨与殖民政府之间的沟通桥梁，更在发生族群矛盾时主动出面协商，建立规则，从而缓解冲突，维护整体利益。在个人层面，不少琼侨也开始积极学习当地语言，尊重主流宗教和风俗，并在做生意时主动寻找合作机会，展现出从对抗逐渐走向有限融合的态度。

总的来看，琼侨与当地社会的关系始终处于一种动态变化之中——既有摩擦，也有调整；既存在隔离，也有互动。这个过程不是单向地被同化，而是琼侨在异国文化环境中，为了保持自身身份认同、同时也为了生存与发展，所做出的一场长期而富有韧性的探索。他们在坚守自身文化根源的同时，也灵活适应现实，不断寻找平衡点，从而在陌生土地上扎下根来，并逐步融入当地社会结构之中。

4 身份认同的构建与变迁

在过去近百年的海外岁月里，琼侨慢慢形成了一种多重的身份认同。他们既认同自己的家乡根源，也逐步建立起对居住国的归属感。这种身份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逐渐塑造和调整的。

在这一过程中，社团扮演了凝聚文化认同的核心角色。通过定期举办祭祖活动、庆祝传统节日、鼓励讲海南话，以及创办华文学校等方式，不断唤醒和加深大家对共同历史和文化的记忆。正是这些看似平常却持续不断的努力，持续唤醒并强化着成员的历史与文化记忆，让琼侨在异国他乡依然能扎下深厚的文化根脉，让“海南人”的身份得以代代相传，也在多元环境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然而，当中国面临抗日战争这一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琼侨的身份认同经历了空前强烈的政治洗礼。他们的爱国情怀从潜在的情感转化为具体的救亡行动。他们的行动与整个南洋华侨社会的救国热潮紧密相连。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从成立“南洋英荷两属琼崖华侨救乡总

会”、“救济琼崖难民会”等核心组织，到动员“星洲团”回乡抗日；从新加坡、马来亚的各地会馆积极募捐，到麻坡、槟城的同乡纷纷响应，琼侨社群为支援家乡抗战贡献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

与此同时，随着在南洋定居日久、代际更迭，另一种认同，对居住国的在地认同，也开始悄然生长。部分琼侨及其后代逐渐适应当地社会，甚至参与到地方事务中去。这种在地认同，与他们对祖籍“海南”的文化认同、对祖国的政治认同并行不悖，构成了他们身份中另一个重要部分。

总而言之，琼侨的身份认同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动态平衡的复杂面貌。对海南故乡的深厚情感、对中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与对南洋居住地的现实融入，三者交织并存。但这并非意味着冲突，反而体现了他们的强大适应力与生命力。战后，许多琼侨及其后代继续在商业、教育等领域发挥影响，他们自身便成了联结海南与南洋的重要文化桥梁。

参考文献

- [1]范若兰. 二战前海南妇女的曲折出洋之路——以英属马来亚为例[J]. 华侨华人文献学刊, 2021(1): 160-176.
- [2]王翔. 近代南洋琼侨的职业类型与经济机能[J]. 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20(1): 13-24.
- [3]张逢博. 试论近代新马地区琼侨社团的建立及其职能[J]. 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12): 129-131, 140.
- [4]王帅君. 以海南岛为基点对近代出洋华工史实的分析[J]. 国际公关, 2023(12): 182-184.
- [5]冯思露. 近代新马琼侨会馆研究[D]. 海口: 海南师范大学, 2022.
- [6]冯子平. 走向世界的海南人[M].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1992: 98.
- [7]苏云峰. 海南历史论文集[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2: 220.

作者简介：琚博雯（2004年8月），女，汉族，山西夏县，三亚学院，本科在读，都市文化研究；王宇（1995年1月），女，汉，河北邯郸，三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都市文化研究，系本文通讯作者。

基金项目：本文系海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HNSK(QN)23-105）《融合与冲突：海南城中村新移民口述史研究》；海南省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S202313892023）《融合与冲突：1860-1950近代百年琼侨社群文化研究》阶段性研究成果。